

區域價值鏈視域下的澳珠一體化構建

殷旭東*

一、區域價值鏈的理論述評

隨着技術的快速發展，產業的分工不斷深化已經成為區域發展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重要現象。正是由於這一現象的出現，引發了人們對產品價值創造體系的全球構建這一問題的深度思考。特別是對一些全球佈局的產業而言，在其產業佈局中早已呈現出全球價值鏈(GVC)¹的形態。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穩定價值形成模式、有利於從比較優勢向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轉化、能夠通過不斷學習和積累要素為經濟起飛打下基礎等有利因素，而許多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等都是通過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實現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嵌入”方式，完成自身經濟起飛的積累。

在全球價值鏈模式下，區域經濟往往會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選擇適合自己的嵌入模式：低端或者高端嵌入。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而言，大多數都由於自身條件限制，被迫或者自覺地選擇“GVC低端”嵌入模式，比如中國內地的長江三角洲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都是通過以低工資、低價格、低技術、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等為代價嵌入GVC參與全球競爭的。這種嵌入方式最大的優點就是嵌入障礙小、門檻低，而且見效快，但是其不利方面也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自身的技術、管理等的劣勢，使得其嵌入GVC的過程中往往採取OEM、OAM以及ODM等方式，然後伺機尋求升級，但由於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技術領先優勢，一旦發現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轉變角色以圖獲取更高利潤的企圖，勢必通過反傾銷、技術壁壘、專利與智慧財產權等各種手段來阻止，然後必然會引發激烈的市場主導權的爭奪。受制於談判能力的嚴重不對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很難在這場爭奪中取得勝利的，因此，GVC模式下的低端嵌入式發

展造成的結果就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模式的“低端鎖定”效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從技術、發展路徑到利益分配全部受到GVC主導者的控制。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低端嵌入往往是一種“切片式”(fragment)的融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本國或本地區產業之間的一體化聯繫，容易形成內部企業之間的橫向分工而引發內部競爭乃至落入“重複建設”、“產業同構”、“惡性競爭”等的窠臼。至於高端嵌入模式，則要求嵌入者掌握高端技術，或者不斷調整並改進產品和生產過程、增加產品的附加值來構建自身的能力，從而獲取競爭力。雖然許多研究者傾向於以融入GVC為首要目標，而不要在意是低端嵌入還是高端嵌入²，但研究顯示，低端嵌入特別是獨立單位的低端嵌入極為容易掉進“鎖定陷阱”中難以自拔。³

採用何種嵌入與生產鏈的運作模式有關。根據相關的研究，價值鏈是建構在生產鏈的基礎之上的，而生產鏈中則存在着生產者驅動、購買者驅動以及混合型驅動三種驅動模式，採用何種驅動模式，主要是取決於生產鏈中核心資本的取向，按照價值鏈的價值分配規律，利潤率最高的環節是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各種不同產業形成的價值鏈則根據自身特點選擇各自適用的驅動模式。⁴ 格雷非等人重點研究了具有高新技術產業特徵的航空、汽車、半導體、電腦、裝備製造業等和具有一般傳統產業特徵的鞋業、服裝、自行車、玩具等兩類產業的不同表現，認為高新技術產業由於掌握核心生產技術而更多採用生產者驅動模式，相對應的一般傳統產業則由於更加依賴銷售環節因而更多採用購買者驅動模式，當然，對於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並重的產業來說，混合驅動模式也許是更適合的。但是，格雷非等人的研究中並不包括服務業在內。⁵

劉奕、夏傑長通過對中國創意集聚區的研究發

* 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現，低端嵌入和高端嵌入只是產業集群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表面現象，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產業集群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途徑有三類：一是契約嵌入，其實質屬於購買者驅動，路徑是通過價值鏈主導者或其他形式的參與者建立契約關係加入GVC；二是以外商投資企業的形式嵌入，通過FDI直接建立嵌入GVC的產業集群，這種方式的產業集群中既包括購買者驅動，亦包括生產者驅動；三就是為國外市場提供產品以及服務以嵌入GVC，這種嵌入方式要求本土水平較高，同時也是最有可能實現集群升級特別是功能升級和鏈的升級的嵌入方式。⁶

區域價值鏈的構建關鍵在於產業集群的水平，根據本地產業集群的發展情況，有目的地選擇一種適合的嵌入方式融入GVC，使得其具備集群、功能以及鏈的升級能力，並以一體化的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而融入全球價值鏈，格雷非認為它是保證發展中國家產業集群登上能力增長“自動扶梯”的必要環節，它將幫助地方產業集群自動獲得從過程升級到產品升級再到功能升級最終到鏈的升級的機制。

二、澳珠分離性產業結構對區域價值鏈的影響

珠海與澳門是中國經濟版圖中十分特殊的一個區域，由於“一國兩制”的關係，它們既不像“長三角”及“珠三角”的城市群一樣，具備制度的連續性，也不像深圳與香港，具有大範圍的產業互補性。從經濟規模以及本身的結構特徵來看，珠海和澳門分屬於小型經濟體和微型經濟體，產業結構都不健全，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都比較弱。隨着珠海和澳門兩地經濟社會發展速度的加快，雙方面臨的全球化競爭更加激烈，面對的未來不確定性風險的機會也在快速擴大，選擇何種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顯然是澳珠兩地必須盡快作答的重要問題。作為一個幾乎渾然天成的經濟區域，澳珠經濟一體化早就已經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但由於事實上的制度差異以及發展思路的制約，澳珠雙方目前的情形實際上存在着人為的割裂，這種割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因為制度的隔絕，無形之中加大了兩地經濟發展協同化的成本和難度，兩種制度下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和操作存在着時間、空間、乃至指導思想上的錯位；另一個方面則是因為長期以來澳珠兩地在不同的產業基礎上分別進行着自身的擴張和延伸，已經形成了較為頑固的慣性

方向，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唇齒相依的兩個經濟體中，產業合作的內容和空間都極為狹小。澳珠之間的微妙關係導致了分離性的產業結構的形成，這也讓澳珠區域價值鏈的形成充滿了諸多的變數和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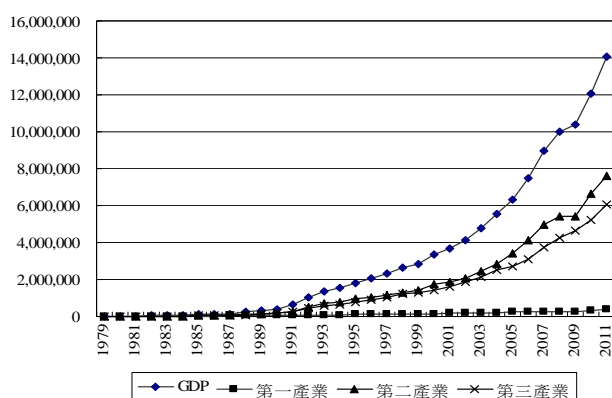
融入全球價值鏈是區域經濟獲得足夠競爭力以及規避風險的重要手段。以格雷非、哈姆弗利和施密茲(Humphrey and Schmitz)等人的研究為代表的意見認為，通過低端融入全球價值鏈的方法，有助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現產業升級從而進入全球價值鏈的高端。⁷而張輝則通過奧地利Styria地區的汽車產業集群的例子指出，如果不能對國外新的競爭威脅和新的市場條件作出適當的產業組織等方面的反應，地區產業集群有可能會出現“分離性陷阱”，導致區內企業形成垂直型一體化的慣性，企業間的信任合作氛圍被完全破壞，非常不利於企業間的分工合作以及強大的區域競爭力的形成。⁸澳珠區域間非連續的制度安排以及分離性的產業結構，帶來的一體化困難在於，一是兩地產業高度不同，不可能通過簡單一體化而低端嵌入的方法融入全球價值鏈；二是不同制度下利益生發機制不一致，很難通過一體化協同雙方的訴求。

自然稟賦的差異以及“一國兩制”下制度的非連續性，使得澳門和珠海兩地的產業結構呈現分離性特徵。在制度連續的緊鄰區域中，政策的協同性可以保證產業結構一般呈現為連續狀態，雖然這種連續性並不足以保證區域價值鏈在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能夠佔據有利位置，但它對於由產業關聯所帶來的區域一體化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⁹，在缺乏這種連續性的時候，區域價值鏈的構成過程中諸方的協調也許會成為重大的障礙。具體到澳珠雙方而言，“一國兩制”雖然為澳門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澳珠一體化的過程中，“一國兩制”則顯然也帶來了諸多的不便。首先就是澳珠兩地在產業政策的協調上，兩地政府出於各自條件的考慮，在兩地產業協調發展的問題上一直未有明確的意見，導致區域發展呈現兩極化，一體化問題懸而不決；其二是兩地資源的梯度化問題嚴重，資源、人才、技術、商品流動壁壘無法消除。“一國兩制”雙向梯度效應極為明顯¹⁰，而在傳統的合作路徑下雙方很難實現均衡；第三就是在“一國兩制”下，澳門與珠海之間的地位不平等，造成雙方在合作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壁壘。

澳門土地狹小，人口密集但技術型高素質人口相對缺乏，一直以來強調的是以博彩旅遊業為核心產業，大力發展文化創意、旅遊休閒、會展等旅遊文化

產業，並在近十多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珠海自建立特區以來，嘗試過多種主導產業，在中國內地以GDP為主要發展衡量指標的大環境中，珠海市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比較重視能夠較快推動經濟增長的產業，因此，珠海的主導產業一直都是以工業為主，輔以旅遊業等第三產業。從珠海市的產業結構圖來看，珠海市大約從上世紀1990年代開始實現經濟起飛，在起飛的初始階段，二、三產業逐漸超越農業，成為珠海市經濟增長的最大助力，而大約是在2000年前後，第二產業(其中主要是工業)一舉超越第三產業，成為珠海市最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圖1)。在珠海市政府的2013年目標中，工業仍然是珠海產業結構中的重中之重。¹¹ 作為有着比澳門更豐富資源支撐的經濟體，珠海雖然亦將旅遊業列為本地區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但是不能指望珠海能夠以全市之力來配合旅遊休閒產業的集群。在這種實際配置下，珠澳一體化的思路不能僅僅局限於產業一體化甚至經濟一體化，更重要的應該從更高的層面來思考。

圖1 珠海市歷年產業構成



資料來源：《珠海市統計年鑒 2012》

區域價值鏈模式下的珠澳一體化問題實際上就是澳門與珠海兩地之間合作過程中面臨的最為現實的關鍵問題。以往人們的研究往往從產業集群、產業鏈以及經濟一體化的角度來研究珠澳一體化問題，但是基於兩地產業結構以及自然稟賦的差異，使得珠澳一體化問題出現了嚴重的內生性障礙，因此研究的焦點只能集中在珠澳合作關係以及珠澳資源整合上。¹² 根據珠澳之間的實際條件，珠澳一體化應該超越產業一體化的乃至經濟一體化的束縛，站在戰略一體化的高度來考慮珠澳之間的未來關係。

三、澳珠區域價值鏈構建模式的選擇

按照全球價值鏈理論，區域價值鏈的發展無非兩種典型模式，其一就是成為GVC核心企業主導的價值鏈條中的一環，然後通過緊跟國際市場並在全球性大買家的帶動下實現跳躍式的升級。但這種模式極容易發生“低端鎖定”而使自己被國際大買家主導的GVC“俘獲”，從而變成價值鏈末端分子。其二就是構建依賴於國內市場、同時與國際市場並行的所謂“國內價值鏈”(NVC)，依託國內市場的強大支撐，實現NVC與GVC的平行發展，並伺機實現突破在GVC中的地位。這兩種模式對於澳珠區域來說，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難。

首先對於第一種模式，無論是對於製造業還是對於服務業，在這種模式下都是由買家驅動而形成的一種價值鏈模式，這種價值鏈模式有兩個要求，一是要求珠澳之間產業結構的同構化或者連續化，這顯然並不符合兩地產業結構的現狀，甚至也不符合兩地產業結構的未來方向；二是要求有大的市場能夠容納下珠澳區域價值鏈的生產和服務，這一點對於澳珠區域亦是困難重重。對澳門方面來說，隨着澳門博彩業的快速擴張，已經接近澳門服務能力的飽和值，同時周邊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內地也已經對博彩服務需求開始有所控制，種種跡象表明，進一步大幅度增長的機會並不是很大。對珠海一方而言，即使能夠通過規劃與建設，在旅遊休閒等方面與澳門實施產業對接，在不考慮新的休閒模式的情況下，單純的旅遊休閒產業市場需求前景相對澳珠區域的發展期望來說，不容樂觀。在這種情況下，區域價值鏈的構建遇上一個結構性的難題，同構或者異構、集群或者分離，也許在澳珠區域的發展期望面前都已變得沒有太大分別。

對於第二種模式來說，從形式上講是比較適合珠澳目前的情形的，事實上也正是依靠着國內市場的強大支撐，使得澳門的博彩旅遊業在短短的十年間從一個小小的不發達小城躡升為世界博彩業的執牛耳者。可是澳門特殊的博彩業持續發展帶來的局部繁榮並不能作為成功範例在珠澳之間進行推廣，而且，珠澳區域價值鏈未來的着力點落在博彩業身上顯然是不太現實的，這是因為博彩業作為一項強烈“利己”的金融活動，很難得到國家以及廣東省乃至珠海市的無保留的支持。因此澳珠區域的長遠價值鏈是要在產業鏈構建的基礎上，從更高層次的角度來觀察其構建。因此，這種模式的價值鏈構建在起步階段，就應該跳出產業鏈構建的圈子，從戰略的層面來設計。從

珠三角區域範圍來看，由於粵港澳實際存在的“一國兩制”現狀，其一體化問題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沒有完全局限在產業或者經濟的範疇，即便是廣東省內的一體化問題看起來相對容易，但通過多年的推動，目前的一體化程度還不是非常理想，許多一體化方案僅僅停留在交通一體化、通訊一體化以及政策一體化等的單一層面，相對更加複雜的“一國兩制”下的珠澳一體化，應該從比這些單一層面更高的位置來考量。珠澳之間的一體化，必須跳出本地利益以及產業一體化乃至經濟一體化的圈子，從珠三角乃至全國的高度來設計和發展，這就是珠澳區域的戰略一體化。通過戰略一體化的方式，構建澳珠區域在全國範圍內獨具一格的區域價值鏈，凸顯本區域在國家戰略中的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是澳珠區域價值鏈應當追求的目標。

澳門是一個缺人才、缺資源、缺市場、缺技術，甚至缺少競爭意識的地區，之所以在複雜的國際競爭中能夠擁有一席之地並奇跡般地實現連續性高速增長，主要就是得益於其產業結構的特殊以及中央政府在政策上的傾斜，珠海作為支持澳門的回歸而配套開放地區，無論是資源、人才還是基礎，與珠三角的發達地區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再加上珠澳區域經濟總量不大，如果單從以GDP為度量的發展角度來進行設計，可以說珠澳區域無論如何構建自己的價值鏈都無法在珠三角地區佔據有利地位，更不用說在國際上參與競爭了。珠澳區域的戰略一體化的構建思路就是，經濟上實現澳珠之間的產業互補、互容、互助式的相容性協調發展，區域形態上依託澳門的國際會展業知名度，努力構建珠三角地區的高科技會展交流中心，政治上則以中央的政治體制改革為背景，依託澳門“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積極開展新型政治體制和社會形態的探索實踐，是構建新型澳珠區域價值鏈的大背景，如果這個過程能夠順利實施，那麼將來的澳珠區域或將能夠在中國的戰略制高點上佔據一席之地，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戰略重地之一。

四、澳珠區域價值鏈的構建

在澳珠區域發展過程中，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兩地各自專注於自己利益，無法形成真正有效的合力構建區域價值鏈，無論是產業方面還是經濟社會等方面，珠澳區域都呈現出一個發散的態勢。澳珠區域要想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有所作為，必須要重新考慮區域價值鏈的構建問題。

(一) 澳珠區域價值鏈的整體構想

澳珠區域價值鏈總體上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從國家戰略層面來考慮，澳珠區域最大的價值應該是从戰略資源的角度出發，盡力打造國家戰略資源的重地。在澳珠區域打造國家戰略資源重地，有三個有利條件。第一，從改革開放算起，澳珠區域就已經是國家戰略規劃中的一個特殊的整體發展區域，經過多年的規劃與調整，區域經濟發展迅速，“一國兩制”下的社會結構也已顯現出簡明、協調、繁榮的特徵，區域素質較高，具備國家戰略實施的基礎；第二就是澳珠區域較為特殊的產業特徵和產業文化。澳門是世界著名的“賭城”，同時借助博彩業的繁榮推高了其他產業的發展台階，旅遊、文化創意及會展等產業欣欣向榮，澳門亦在尋求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珠海則依託澳門，利用自己豐富的資源構築了強大的旅遊業基礎，同時，珠海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建設成了世界五大航展之一的珠海航展，是我國航空航天科技最重要的國際交流舞台之一。澳珠兩地特殊的產業特徵和產業文化為我們設計國家戰略資源基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第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內地的經濟社會各方面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以消耗資源和環境惡化為代價換得發展的做法亦已經走向盡頭，急需要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的升級換代，但由於西方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懷有戒心，高新技術的交流 and 引進存在極大的困難和障礙，雖然中國內地有不少高級別的高新技術會展舉辦，但成效甚是有限，無法滿足中國國家快速發展的需要。因此，中國正急需一個高水平的高新技術展出和交流的平台，成為真正的國家戰略資源儲備和促進中心。

第二個是從區域產業結構層面來考慮。澳門是一個產業結構非常單一的微型經濟體，除了佔絕對主導地位的博彩業之外，建築業、製造業、服務業等寥寥幾個行業就佔據了澳門經濟的絕大部分構成，珠海的產業結構雖然較澳門來說有一定的複雜性，但無論是旅遊業還是製造業、服務業，雙方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間。依託澳珠兩地的相似產業應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構建較為完整的區域價值鏈，不過需要認識到的一點是，無論澳門和珠海之間的產業鏈如何構建，合作的深度如何，澳珠區域產業高度以及產業規模決定了其區域價值鏈的升級前景不容樂觀。

基於以上兩個層面的分析，筆者認為珠澳區域價值鏈的構建中有幾個關鍵性的問題必須釐清。珠澳區域價值鏈的構成應該分為兩條綫路，一條是依據珠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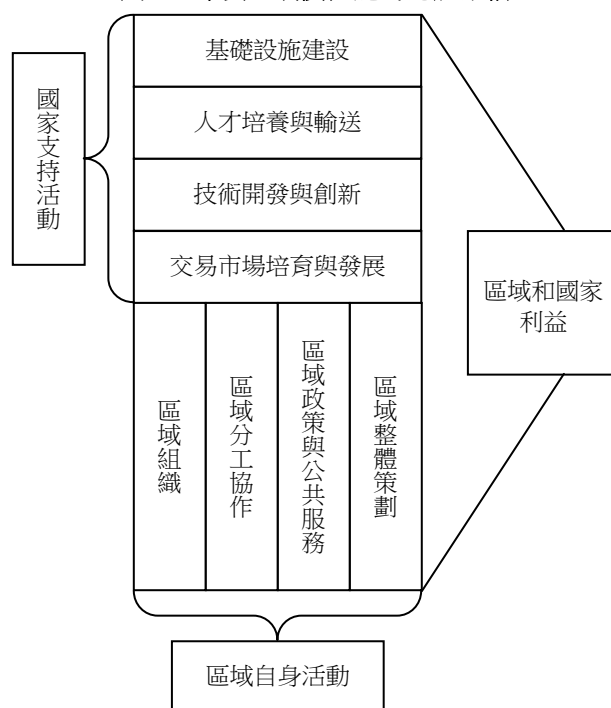
兩地產業結構的特點，構建以休閒旅遊以及文化創意等產業集群為基礎的區域價值鏈，依託澳門服務業的前瞻性、高度化以及珠海地區的高端資源，這條區域價值鏈應該是具有生產者驅動特徵的價值鏈條；另一條綫路則是依據國家的戰略需要，促成以高新技術展現與交易為核心目的的會展業產業集群，然後緊密依託國內以及國際市場，構建一條購買者驅動的區域價值鏈。

(二) 澳珠區域價值鏈具體結構及其運作模式

澳珠區域價值鏈由兩條綫路的鏈條組成，其基本結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國家支持活動，另一部分則是區域的自組織活動，這兩個部分，又必須依託粵港澳的一體化和橫琴的開發同步進行。根據國家對澳珠區域的總體規劃，粵港澳的進一步緊密協作已經啟動，澳珠區域正面臨着一個新的發展地位的設定以及發展方向的選擇，澳珠區域價值鏈的關鍵在於澳珠地位的設定。在傳統的澳珠兩地政府觀念中，比較重視的是能夠為本地帶來直接價值的發展方式，比如在橫琴的開發中，珠海市強調的是橫琴的產業規劃問題，而澳門則是關注新澳門大學和中醫藥產業園等的建設問題，雙方並沒有找到一個協調雙方利益並將利益長遠化、最大化的方法。如果能夠從國家層面來解析澳珠區域價值鏈的價值生成以及傳遞原理，則會出現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澳珠區域在整個珠三角區域經濟中所佔地位並不出色，如果僅僅從澳珠區域的經濟一體化出發，“即使在橫琴島上的每一片土地都鋪上金磚，亦是值不了多少錢的”，可謂一語中的。再加上珠海與澳門兩地工業甚至商業基礎都並不發達，如果走一條與其他地區無異的經濟開發之路，澳珠區域沒有優勢，橫琴島最後勢必成為珠海的一個普通的開發區，完全失去了“比特區還特”的政策意義；而如果完全偏向澳門，從整個產業結構上完全配合澳門的產業多元化來開發橫琴，也只是一個澳門單邊受益的片面繁榮方案，珠海以及國家的利益無法完全體現，更何況這種方案的可持續性亦值得懷疑。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雙方的比較優勢，最大限度的利用好橫琴的每一片土地，做到橫琴開發的利益極大化。在圖2所示的澳珠區域價值鏈總體結構中，整個區域的價值來源於國家支援活動與區域自身活動兩大板塊。其中的意義主要在於兩點，一點是國家在橫琴設立國際水平的技術展覽與交易中心，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使澳門與珠海協作成為此會展與交易中心的共同管理及受益者；第二點則是通過國家相關政

策以及澳珠兩地的協作，在橫琴進行旅遊、文化創意、會展等服務業的集群佈局，並通過形成產業鏈的方式提升其區域價值鏈層次。以這兩點內容為核心的澳珠區域價值鏈形成後，一方面能夠全面整合澳門與珠海的服務業資源，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為澳門和珠海兩地的經濟持續增長打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通過國家的整體協調，憑藉澳門會展業的延伸作用以及珠海高水平會展的寶貴經驗，與已有十多年歷史的珠海航展一道，構建澳珠協作的國際技術展覽與交易中心，形成各類高水平的高新技術展覽與交易的國際平台，勢必帶來比單一的珠海航展更加令人期待的經濟及戰略收益。

圖2 珠澳區域價值鏈的總體結構



五、結語

珠澳地區是中國區域結構中一個非常特殊的區域，經濟發達、社會簡明而且具備“一國兩制”十多年的寶貴經驗，如果僅僅從經濟層面來衡量珠澳區域價值鏈，是非常淺薄而短視的。而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在國際技術市場特別是涉及高新技術的領域仍然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在世界各類高新技術交易市場上還很難取得突破，若能利用橫琴開發之機，以澳珠合作的方式建立一個開放性的國際化會展交易中

心，以會展業推動澳門的產業多元化，同時為國家的戰略利益建立一個重要的基地，假以時日，澳珠區域不僅會是世界著名的旅遊休閒中心，亦會發展成為中

國最重要的技術擴散中心，這不僅符合澳珠兩地的共同利益，同時也是符合國家的最根本利益的。

註釋：

- 1 根據 Kaplinsky and Morris 的定義，全球價值鏈指的是在全球範圍內考察產品從概念、設計、生產、銷售直至消費這一價值不斷增值的過程。See Kaplinsky, R. and M. Morris (2001).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 In the website of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olicy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PRISM): <http://www.prism.uct.ac.za/Papers/VchNov01.pdf>. 30th June 2013.
- 2 張輝：《全球價值鏈動力機制與產業發展策略》，載於《中國工業經濟》，2006年第1期。
- 3 劉奕、夏傑長：《全球價值鏈下服務業集聚區的嵌入與升級》，載於《中國工業經濟》，2009年第12期。
- 4 Gereffi, G. (199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8. 37-70. 同註2。
- 5 Gereffi, G. (199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8. 37-70.
- 6 同註3。
- 7 Gereffi, G. (199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8. 37-70. Humphrey, J. and H. Schmitz (2000).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Link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lobal Value Chain Research. IDS Working Paper 120. In the website of Biblioteca de Fundación Standard Bank: http://biblioteca.fstandardbank.edu.ar/images/e/e6/Clusters_11.pdf. 30th June 2013.
- 8 同註2。
- 9 Henderson, J. V. (1974). The Size and Types of Cit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No. 4. 640-656.
- 10 殷旭東：《“一國兩制”的雙向梯度效應及珠澳一體化的路徑》，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3年第1期(總第15期)。
- 11 何寧卡：《珠海市政府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
- 12 郝雨凡、姜姍姍：《澳門多元經濟與珠澳整合》，載於《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